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 内地的发展及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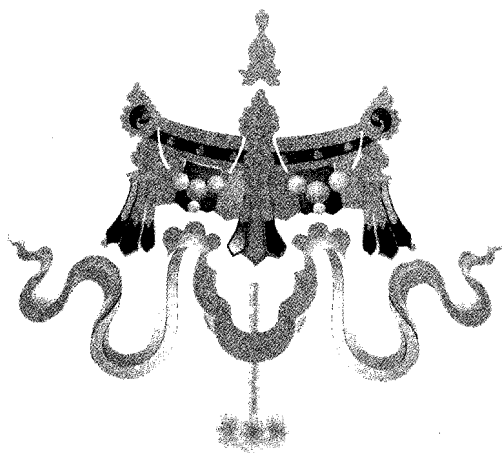
赵改萍/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 内地的发展及影响

赵改萍/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 / 赵改萍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004-8337-3

I. 元… II. 赵… III. ①喇嘛教—佛教史—研究—中国—元代
②喇嘛教—佛教史—研究—中国—明代 IV. 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3240 号

责任编辑 雁 声
特邀编辑 骆 珊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72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唯一具足世界梵巴、汉、藏三大语系佛教的国家，三大语系佛教中的汉、藏二大系，皆以中国为中心。汉、藏二系佛教，长期以来交流融会，与汉、藏等多民族一样，骨肉相连，密不可分。汉、藏佛学互动互补，交相辉映，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初以来，藏传佛教再次传入内地，至今方兴未艾。汉藏佛教的交涉，是中国佛教史及当代中国佛教研究中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当今佛教的建设和管理提供借鉴，还有助于当今民族关系特别是汉藏关系的和谐。

元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进程中重要阶段，南宋末，西藏融入大元版图，藏传佛教随之传入汉地。明代继承蒙元的治藏方略，采取“多封众建”政策，藏僧大批来到内地，藏传佛教在内地继续传播。藏传佛教影响了内地儒家、道教、汉传佛教以及民间宗教的思想和表现形式，这种碰撞、交流、融合，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日益丰富和发展。藏传佛教传入内地以来，创造了灿烂的建筑、绘画、塑像等佛教艺术，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对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之传播，国内外学者多有关注，但多数学者关注的只是一些微观的研究，如人物、佛教艺术、历史事件等，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专门论著问世，很需要有人作这方面的宏观研究。

赵改萍博士刻苦用功，勤奋上进，好学深思，她原学历史，史学功底深厚。读硕士期间，随著名学者吕建福先生学习，在民族史、密教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并在西藏民族学院学习藏语，能够阅读藏文文献资料，同时家近五台山，多次到该地考察，掌握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发展的翔实资料，其硕士论文《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及影响》写得不错。在四川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她努力深入教海，研读经论原典，掌握佛学研究的方法，选定《元明时期藏传

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为博士论文题目。她积多年之功，在广泛收集藏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联缀零星分散的历史残片，追寻扑朔迷离的历史痕迹，深入分析，整体构建，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一书，系统论述了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背景、教派、思想教义、历史演进、分布地域、人物及寺院建筑等内容，并重点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内地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全书从宗教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历史地、真实地、深刻地、较完整地展现了西藏与内地通过藏传佛教的媒介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展示了藏汉民族密不可分的关系，揭示了藏传佛教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中特殊的历史作用。该书填补了汉藏佛教研究的空白，资料翔实，内容丰满，获得专家的一致好评。毕业两年以来，赵改萍博士对论文又做了补充修改。综观该书的写作与内容，其特色大略有如下四点：

一、资料扎实。作者非常重视汉藏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利用。论文中除运用《元史》、《明史》、《四库全书》、《大正藏》等汉文资料外，还大量运用《红史》、《贤者喜宴》、《青史》、《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土观宗派源流》、《朗氏家族史》、《蒙古佛教史》、《安多政教史》、《萨迦世系史》、《汉藏史集》等藏文资料。由于资料收集相对完备，不仅保证了研究具有坚实的史实基础，而且还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内容丰富。作者在解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剔抉爬梳，潜心研究，着力于论述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历史发展及影响；又深入阐述各朝藏传佛教传入内地的历史背景和统治者崇信藏传佛教的原因；同时又深入考察藏传佛教各派僧人与元明两朝的关系以及在内地五台山、北京、杭州、南京等地的一些弘法活动，进而阐明他们在推动西藏地方与元明中央王朝的关系及促进汉藏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积极贡献。在上述内容基础上，作者将元明两个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藏传佛教在民族团结和汉藏文化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程度受民族文化差异影响的这一历史发展规律。这为人们系统而完整地了解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提供了详尽的历史信息。

三、角度新颖。作者打破以往学者多注重政教关系的研究视角，从历史学、宗教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多角度，通过实地考察发掘实物资料，采取由点到面、由分析到归纳、权衡比较等方法，对元明近四百年间藏传佛教东传内地的

背景、历史发展及其特征和影响等方面，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释。如以五台山为例，书中廓清了元明两朝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历史概貌，阐明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地位和作用，并指明它具有汉藏并存、民间性、历史延续性等特征。因为明代之后，清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渐至鼎盛，至民国时期渐趋衰落，但仍有来自内蒙、西藏、甘肃等地的僧人到此弘扬藏传佛教。可见作者既注意历史的阶段性研究，也注意历史的整体性研究；既注意五台山区域佛教的研究，也注意与国内其他地区佛教的比较研究。

四、见解独到。作者善于研读和运用文献、考古资料，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见解。诸如元明统治者尊崇藏传佛教的原因、藏传佛教在元明时期发展的历史条件、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比较等等。这一系列具有新意的见解，把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填补了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总之，《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一书，既具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是一篇较优秀的博士论文。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一件好事，故乐为之序。

陈 兵

2009年5月于四川大学竹林村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及在内地的早期传播	(15)
第一节 藏传佛教在吐蕃的形成与发展	(15)
一 藏传佛教的形成	(15)
二 藏传佛教的发展	(21)
三 藏传佛教的特点解析	(23)
第二节 藏传佛教在内地的早期传播	(25)
一 藏传佛教在内地早期传播的历史和文化基础	(25)
二 藏传佛教在内地的早期传播	(32)
第二章 元朝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	(42)
第一节 蒙古统治者借藏传佛教实现对吐蕃的统一与管理	(42)
一 蒙古统治者借藏传佛教实现对吐蕃的统一及管理	(42)
二 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51)
第二节 藏传佛教在蒙古上层的传播	(53)
一 藏传佛教在蒙古上层的迅速传播	(53)
二 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的原因	(64)
三 元朝帝师制度的形成及对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作用	(74)
第三节 元代藏传佛教在大都的传播	(81)
一 藏传佛教在宫廷的传播	(82)
二 藏传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对勘	(110)
三 藏僧大量涌入京城	(114)

四 藏传佛教寺院的修建	(119)
五 元代藏传佛教在大都传播的小结	(126)
第四节 元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	(126)
一 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弘传	(126)
二 藏传佛教在五台山传播的特点及影响	(134)
第五节 元代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的传播	(135)
一 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及对藏传佛教在江南传播的贡献	(136)
二 胆巴及其他高僧在江南修萨迦密法	(143)
三 管主八刊刻藏传佛教经典	(147)
四 藏传佛教在江南的传播特点及影响	(150)
第六节 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特征及影响	(152)
一 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特征	(152)
二 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影响	(158)
三 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的影响	(161)
四 藏传佛教对元代文化的影响	(164)
第三章 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	(177)
第一节 明廷以“多封众建”为核心的治藏政策	(177)
一 元末明初西藏的形势	(177)
二 明朝“多封众建”为核心的治藏政策	(180)
三 明朝治藏政策的评述	(195)
第二节 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历史基础	(198)
一 明朝对西藏的成功管理,是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前提	(198)
二 唐以来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成为藏传佛教 在内地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历史基础	(198)
三 元代藏传佛教的东传,为其在明代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200)
四 明朝诸帝尊崇藏传佛教,客观推动了它在内地的发展	(201)
第三节 藏传佛教在南京的传播	(202)
一 藏传佛教传入南京	(202)
二 大宝法王在南京	(207)
三 大乘法王在南京	(212)

四 大慈法王在南京	(213)
第四节 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兴盛	(215)
一 萨迦派在北京的发展	(216)
二 格鲁派在北京的传播	(218)
三 噶举诸派僧人在北京的活动	(222)
四 明朝京城之藏传佛教寺院	(242)
五 明朝京城之西天僧	(246)
六 明代诸帝尊崇藏传佛教的原因	(252)
第五节 明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	(255)
一 明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发展的原因	(255)
二 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	(256)
三 明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发展的特点	(263)
第六节 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特点及影响	(265)
一 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特点	(265)
二 藏传佛教在明朝政治中的地位及影响	(272)
三 藏传佛教对明朝经济的影响	(276)
四 藏传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277)
第七节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比较研究	(290)
一 相同之处	(291)
二 不同之处	(294)
结语	(305)
参考文献	(308)
后记	(322)

绪 论

藏传佛教在公元 12 世纪末传入内地，它不仅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形式引起统治者及广大民众的兴趣，同时也承载着藏族丰富的文化信息，成为传播文化、交流思想的载体。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使得西藏文化日益呈现内向性的特征，这种内向性不仅成为汉藏民族互信的基础，也是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本书从宗教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历史地、真实地、深刻地展现了西藏与内地通过藏传佛教的媒介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展示了藏汉民族密不可分的关系，揭示了藏传佛教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中特殊的历史作用。鉴古以知来，藏传佛教作为佛教一支鲜活的宗教形态，已经深深扎根于藏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藏族同胞社会文化生活中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藏传佛教也必然以其“和合向善”的佛教根本精神，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藏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与汉族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自唐代文成公主进藏开始，汉藏民族的交流一直未曾中断。唐蕃文化的交流，不仅给西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汉地佛教也在此时传入吐蕃。藏族人民在吸收印度佛教、汉地佛教及苯教的基础上创造了神奇的藏族宗教文化——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兴起于 7 世纪中叶，发展于 10 世纪下半叶。12 世纪末，藏传佛教进一步向东传播至西夏。到元代，西藏被划入元朝中央版图，藏传佛教便随之迅速进入汉地。明代继承了元朝的治藏政策，采取“多封众建”政策，使藏僧

大批来到内地，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清代沿袭元明的治藏政策，并有所发展，使得西藏佛教格鲁派日益扩展到内外蒙、青海、甘肃、云南等地，随后也在内地兴盛。但从嘉庆中晚期到鸦片战争爆发，随着政治的腐朽和经济的落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逐渐衰落。

众所周知，宗教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历史现象，它总是处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之下，在这一点上，藏传佛教的情况尤具典型性。藏传佛教是佛教三大流派之一，是藏族的民族宗教，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周围地区各民族的影响。元代蒙古族利用藏传佛教实现了对西藏的统一，建立了以宗教为纽带的政治关系，该政策为明清统治者所继承和发展。历史证明，藏传佛教在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方面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且对今后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藏传佛教传入内地以来，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思想方面，藏传佛教影响了中国儒家、道教、汉传佛教以及民间宗教的思想和表现形式，它们之间除存在某些碰撞外，更多的是相互交流与融合，正是这种交流与融合，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日益丰富和发展。此外，藏传佛教传入内地以来创造了灿烂的建筑、绘画、塑像等佛教文化艺术，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在经济、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研究这一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再现历史，更重要的是可以唤起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也说：“人性既然不变，而且各地相同，那么历史——对人类的以往活动记录——便能帮助人们预测未来，对比现实。”历史、现实与未来是密切联系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借鉴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充分发挥藏传佛教的多种社会功能，使得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制度逐渐适应，改变了藏传佛教的旧有面貌。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来的成功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肯定当前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仍需思考未来。因此，对元明时期藏传佛教的研究也是适应现实之需。

二

关于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之研究，国内外研究者多有关注。但

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关于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专门论著。国内的具体研究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在新中国成立前，属于研究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主要从政治的角度研究两个朝代与西藏的关系，涉及专门研究宗教方面的论文较少。从宏观来说，研究者从整体论述元明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之关系的同时，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及影响等问题，如《中西教会报》及《蒙藏月报》上发表了多篇西藏佛教和元明中央王朝的关系。^①王宜昌对藏传佛教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于1941年发表了《喇嘛教在中国》，第二年发表了《〈喇嘛教在中国〉补遗》（《力行》5卷2期，1942年2月），对上一年发表文章之不足给予修订和补充。^②法尊法师1944年发表《元明间与中国有关之西藏佛教》（《文史杂志》4卷，第9、10期）一文，详细考述了自元代以来，中央政府利用藏传佛教及其领袖统治藏区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并阐述了元明两代藏传佛教在中原各地的传播与影响。

从微观而言，研究者对该问题亦加以关注。如谭英华《元喇嘛教徒对中国艺术的贡献》（《东方杂志》41卷第11期，1945年9月）、《喇嘛教与元代政治》（《东方杂志》42卷第2期，1946年2月），这两篇文章具体论述了元朝政治、艺术与喇嘛教的关系，由于元朝尊崇喇嘛教，对当时的政治、艺术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外，还有《明乌斯藏初通中国考》（《史学杂志》第1期，1945年12月），考察了乌思藏与明朝之关系。韩儒林先生《〈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真理杂志》1卷第3期，1944年6月）一文，根据《明史》等有关史料，对大宝法王的相关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述。

由吕澂先生编校，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被成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列为专刊第二种第一册，内容共收二种：（1）汉译藏密三书；（2）藏传中土佛法源流。全书系汉藏对照，第一种为密宗要典，第二种以藏人眼光阐述内地佛法，饶有趣味，原文为藏文，详注汉字出处。两种藏文，皆依据多种刻本详加校勘，凡勘正章节文字之讹误不下数百字。各篇之前又冠以极长之序文，于前者详述其源变，于后者批评其内容，精深宏

^① 《宫中传喇嘛僧诵经》，《中西教会报》（复刊）第196册，1908年2月；《西藏佛教与内地因缘》，《蒙藏月报》11卷第2、3期，1940年3月等。

^② 《力行》4卷第5、6期，1941年11和12月。

博。^①直至今今天依然是汉藏佛教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史料。

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新中国成立，可谓改天换地，这为中国学术界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可惜，后来运动不断，尤其是“文革”期间，学术几乎陷于停顿，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与藏传佛教研究相关的文章着实不多。据统计，1950—1979年，只有100余篇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大多发表在《现代佛学》等杂志上。在这寥寥无几的研究中涉及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的文章更少。通论方面：如吕澂《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现代佛学》1953年第8期）论及了汉藏佛学交流的渊源。韩儒林《元朝是怎样管理西藏的》（《历史研究》1959年7月），详细论述了元朝和西藏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元朝为完成对西藏的管理而采取的一些措施。杨泓《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宿白《赵城金藏和弘法藏——释藏杂记》和王辅仁《关于西藏黄教寺院集团的几个问题》等，均是重要的学术论文。典籍方面，法尊法师《〈菩提道次第论〉的造作、翻译、内容和题解》和《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②，系研究宗喀巴大师及其名著《菩提道次第论》的两篇力作。前者是对宗喀巴大师造论的原因、翻译等提纲挈领的解题；后者则分析《菩提道次第论》的哲学思想。寺院圣迹方面：黄胜璋《北京白塔寺的白塔创建年代及中尼文化交流》（《现代佛学》1961年第4期）考述了白塔寺的创建年代及其在中尼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谢佐《青海乐都瞿昙寺考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是有关藏传佛教名寺瞿昙寺历史发展的较为全面的志书。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至今。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家建设日新月异，学术研究随之日趋繁荣，藏传佛教研究的硕果累累，并呈逐步增多之势。八九十年代以后，除相当一部分报刊杂志刊发具有时效性和普及性较强的新闻报道或藏传佛教介绍性文字外，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逐年增多，内容也日渐丰富，涉及政教、经济、传播、人物、寺院圣迹及文化交流等方面。深度也有所提高，不仅有宏观把握这一时期的著作出现，而且在微观上进一步深化，除涉及大众性题目外，也出现一些具体考证研究的成果。此外，藏族学者逐步增多，藏汉民族的学者用藏文发表的论文在数量上也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① 王启龙、邓小咏：《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法音》2001年第8期。

^② 《现代佛学》1954年第11期和《现代佛学》1957年第12期。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历史发展方面：首先，在不少学者的著作中都涉及了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情况，如邓锐龄《元明中央王朝和西藏地方关系》、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陈庆英《元帝师八思巴》、伊伟先《明代西藏史研究》、熊文彬《元代汉藏艺术交流》、黄春和《藏传佛教艺术鉴赏》等。其次，论文方面，数量较多，内容也逐渐丰富，程度也随之加深。由于蒙藏两个民族在历史和宗教方面的特殊关系，讨论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传播的文章数量最多。杨绍猷《喇嘛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民族研究》1981年第5期）一文，对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渊源和历史进程作了阐述。李德成《蒙古社会接受藏传佛教的宗教思想基础》（《藏学研究》1983年）认为，藏传佛教渗入蒙古社会的宗教思想基础是蒙藏二民族具有共同的宗教历史传统。有不少学者讨论了藏传佛教在青海的传播，《青海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多篇文章^①。其中吴均概述了青海地区的藏传佛教与寺院状况。王岩松分析了藏传佛教对青海地区的社会影响。蒲文成论述了藏传佛教诸派在青海的早期传播及后来改宗格鲁派的过程。^②也有学者论述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情况，如李冀诚《藏传佛教与五台山》（《五台山研究》1988年第4期），文中不仅叙述了五台山与西藏的渊源关系，且提出五台山与西藏开始最早接触在宋代的主张，并对藏传佛教各派在五台山的传播作了简要论述。王璐《五台山与西藏》（《五台山研究》1995年第4期），不仅论述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还对藏传佛教寺院、教派、著名僧人都作了考证。温金玉《五台山藏传佛教与民族团结》（《法音》2003年第2期）、郜林涛《元代萨迦派在五台山的传播》（《文物世界》2004年第1期）等都是研究五台山藏传佛教方面具有重要参考性的文章。另外，研究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方面的文章也较多，如朱丽霞《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论述了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背景、途径等。陈楠《明代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讨论了明代藏传佛教对内地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何孝荣《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指出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原因是藏传佛教宣扬“即身成佛”、重视仪式巫术、强调男女“双修”等；还论述了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

^① 吴均：《青海地区的藏传佛教与寺院》（《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82年9月），王岩松：《藏传佛教对青海地区的社会影响》（刊出同上），青海历史梗概组编写：《宗教在青海的传播及影响》（刊出同上，第14辑，1985年12月）。

^② 《藏传佛教诸派在青海的早期传播及其改宗》，《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

国家统一具有的积极意义,以及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陈崇凯《元明藏传佛教内传后对中原文化的贡献》(《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论述了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内传及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薛学仁《元代西藏与汉地经济、文化交流》(《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王启龙《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的影响》(《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和《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西藏研究》2001年第4期)、王沪生《元代喇嘛教在汉地的传播与影响》(《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3期)等都是研究这一领域重要的文章。

藏传佛教典籍方面:很多藏文史籍被翻译,如刘立千翻译的《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土观宗派源流》等,还有陈庆英翻译的《萨迦世系史》、《红史》、《汉藏史集》等,这些藏文典籍的翻译和整理,为我们研究藏传佛教及西藏的历史提供了帮助和参考。具体的佛经方面也有很多成果,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大乘要道密集》的出现和研究^①。该经典不仅使我们了解了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密法流传的情况,而且又一次证明汉藏文化的交流的繁荣。

藏汉佛教关系研究方面:历史上藏汉民族荣辱与共,亲同手足,历代藏汉关系紧密,历来为学界重视,因而这方一面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其中唐景福《西藏佛教与汉地佛教关系浅谈》简述藏汉佛教的关系。^②苏晋仁考述了《至元法宝堪同总录》编撰的缘起、参加编撰的藏汉官员和僧人、藏汉佛典对勘的内容等方面,对历史上藏汉佛学界携手合作藏汉佛典对勘事迹作了系统考述和高度评价^③。刘先照《从藏回汉等族的宗教史比较研究看他们的信仰程度》、周宏伟《朗达玛灭佛与唐武宗灭佛之比较研究》等文章也有重要参考价值^④。在藏传佛教与五台山、峨眉山的汉地佛教圣地的渊源关系及藏汉佛教关系方面也有学

① 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大乘玄密帝师考》(《佛学研究》2000年第9期)、《〈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佛教》(《西藏研究》2003年第4期)等。

② 唐景福:《西藏佛教与汉地佛教关系浅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③ 苏晋仁:《藏汉佛教学者团结合作的盛举——纪念佛经对勘七百周年》,《西藏研究》1985年第4期。

④ 刘先照:《从藏回汉等族的宗教史比较研究看他们的信仰程度》,《民族文史论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周宏伟:《朗达玛灭佛与唐武宗灭佛之比较研究》,《西藏研究》1988年第2期;水渺:《汉藏佛教异同论》,《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者关注^①。孙悟湖《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略述》（《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与《元代喇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论述了元代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经典对勘、修行、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影响，颇具参考价值。

藏传佛教与元明时期的政治关系方面：研究成果较多。仁庆扎西《元代管理吐蕃的中央机构宣政院》（《藏学研究文集》1985年）系统考察了元代佛教管理机构宣政院的来历及功能等内容。石硕《西藏教派势力与元朝统治集团的宗教关系》（《藏学研究论丛》1993年）认为元朝统治者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所产生的宗教联系，正是基于相互的利益需要，同时两者之间也恰好是通过这种以宗教为纽带的联系而达到了某种利益平衡，从而使两者在宗教和政治上牢固地结合为一体。元代，西藏政教势力与元朝统治者之间所发生的这种深刻利益关系及由此而导致的紧密结合，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将西藏深深地纳入了中原王朝的政治体系之中，而且基本奠定了元以后西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模式。陈庆英《简析元代藏传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社会科学参考》1991年第1期）分析了元代藏传佛教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仁庆扎西《西藏佛教与元王室》（《西藏研究》1995年第2期）探讨了元王室和西藏佛教各派的关系。周齐《明代佛教政策的基本模式》（《佛教与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分析明代对藏族的佛教政策，不论封授藏地僧俗首领还是厚赏薄来等，都是利用藏传佛教怀柔西藏，达到统一与管辖西藏的目的。何孝荣《明成祖与佛教》（《佛学研究》2002年）指出，明成祖对佛教的支持是因为佛教具有“阴翊王度”的作用，对佛教的崇信是明成祖制定佛教政策的基石和出发点，这一政策对他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佛教的整顿和限制为后世继承，影响深远。当然，明成祖的倡佛也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陈庆英《明代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论述了明代中央政府加强与西藏地方的宗教联系，从而达到控制对西藏的影响之目的。才让《明武宗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其相关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详细考察了明武宗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和一些相关事实。周润年《论明代的“多封众建”及其他》（《藏学研究论丛》1993年）、彭建英《元朝治藏方略》（《西北史

^① 温玉成：《五台山与蒙元时代的佛教》，《五台山佛教》1987年第5期；欧朝贵：《五台圣地与西藏圣僧》，《西藏民族宗教》1994年第1期；辛补堂、郑志忠：《五台山的藏传佛教》，《西藏民族宗教》1994年第3、4期；黄灏：《藏传佛教与五台山》，《中国民族报》2003年9月24日（宗教版）等。

地》1999年第4期)、吉思《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等,都具有参考价值。

藏传佛教艺术方面:元代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艺术成为学者讨论的焦点,研究成果较显著。宿白《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文物》1990年第10期)对杭州的藏传佛教遗迹玛哈噶刺像等进行了考证。赖天兵先后发表《杭州飞来峰55号龕顶髻尊胜佛母九尊坛城造像考》(《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杭州飞来峰元代石刻造像艺术》(《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杭州飞来峰91号龕藏传佛教造像考》(《中国藏学》1999年第3期)、《杭州飞来峰元代第84龕造像探讨》(《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等数篇论文,详细考证了飞来峰的藏传佛教造像内涵、来源及其特征等内容。熊文彬《元朝宫廷的“西天梵相”及其文学作品(上)》(《中国藏学》2000年第2期)、《元朝宫廷的“西天梵相”及其文学作品(下)》(《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两篇文章考察了元代宫廷“西天梵相”的来源、特征,并对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进行分析。黄春和《从佛教造像看北京地区古代雕塑艺术》(《宗教艺术》2003年第6期)分析了元明清时期北京地区藏传佛教造像的特征及产生原因。认为北京地区佛教造像艺术进入了明显的衰微期,这一方面与明代整个社会审美观念的下降有关,同时也与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广泛流行分不开,因为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注重造像的比例和量度,限制了艺术家的创造和发挥,从而使造像艺术普遍趋向于程式化的发展,而丧失了个性化的艺术魅力。此外,陈利华《明代汉藏石刻艺术交流的结晶——北京五塔寺金刚座》(《中国西藏》2003年第6期)、赵培成《试谈五台山藏传佛教与金刚神舞》(《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等亦可作参考。

人物方面:元明时期在内地活动的藏僧很多,由于他们在汉藏文化交流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也为学者们所重视和研究。如王尧《〈山东长清大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考释补证》(《藏学研究》1983年)对该法旨碑进行了考证和研究,指出其价值是研究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重要史料。陈庆英《元代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2期)详细考证了历任帝师的事迹。另一文《胆巴国师考》则详细考证了胆巴的事迹,涉及他在内地活动的事迹。王启龙《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巴希关系新探》(《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和周润年《十三世纪噶玛噶举派活佛——噶玛巴希》(《西藏研究》1997年第2期)研究了八思巴、噶玛巴希和忽必烈的关系及其影响。陈高华《略论杨琏真伽和杨暗普父子》(《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